

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研究 ——从科类、专业角度谈起

谢作栩, 王伟宜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361005)

[摘要]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从科类和专业角度入手, 对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情况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发现, 在文、理、工、管四科中, 管理学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最大, 而在理科中差异最小。此外, 就各阶层子女在专业上的机会差异而言, 上层社会子女大多选择那些优势或就学成本较高的专业, 而下层社会子女大多就读于一般的基础理论或就学成本较低的专业。文章同时指出, 就高等教育系统本身而言, 缩小社会阶层子女在科类和专业上的入学机会的差异必须以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的调整与制定为前提。

[关键词] 阶层; 科类; 专业; 入学机会差异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717(2005)04-0058-05

1990年以来, 随着市场化的推进, 社会分化现象在我国日益凸显起来。社会分化不仅表现在原有的城乡分化、省市区分化, 而且也体现在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阶层分化。以往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出现了像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这些新的社会阶层。阶层分化实质上是各种利益分化的结果。为了各自的利益, 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都会竭力使本阶层利益最大化并尽量排挤或防止其他阶层侵占本阶层的利益。对利益的争夺与分配成为各阶层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走上了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的道路。短短几年的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相比以往的精英高等教育而言, 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然而, 高等教育机会的普遍增加是在社会阶层分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使人们尤为关注, 机会总量的增加是否给每个阶层的子女都带来福祉? 各阶层子女在获取新增加的高等教育机会方面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就目前我国现实情况而言, 高等教育机会仍然是一种稀缺资源。由于文凭在个人日后职业地位升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于这种稀缺资源的争夺以及如何分配自然成为各阶层倍受关注的一个领域。而由于各阶层在收入、权力、地位等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必然对各阶层子女在实际获取高等教育机会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社会出身不仅影响子女能

否接受高等教育, 而且对其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就读哪类高校及哪种科类和专业)也有限制, 因此, 本文将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各个科类及专业中的入学机会差异, 并寻找缩小机会差异的有效途径。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依据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划分标准, 社会成员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阶层。本文中的社会阶层的划分是引用了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研究成果。该课题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 将当前我国的社会职业结构划分为十大阶层, 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本文将借用这一划分结果, 探讨目前我国这十大阶层子女在科类选择和专业入读方面的机会差异。

同时, 为了解各阶层子女在科类和专业上的分布情况, 我们选取了来自陕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安徽及上海等地的8所部属重点高校的文科、理科、工科及管理科学四大科类中的分布于12个专业的共1613个样本量为分析对象(样本来源于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

* [收稿日期] 2005-04-19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批准号:A1A030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谢作栩(1950-), 男, 福建仙游人, 博士, 厦门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高等教育社会学研究。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缩小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差异”数据库)。此外,我们将采用辈出率及描述统计分析等方法来衡量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差异程度^[1]。

二、结果与分析

1. 各科类中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情况

对选取的 1 613 个样本量运用 SPSS 软件统计包进行处理,结果见表 1。从表 1 辈出率的统计结果来看,文、理、工、管四科中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接下来我们分别分析这四科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差异程度。

首先来看文科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差异状况。在文科当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工商户这五个阶层的辈出率都大于 1,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辈出率最高,为 6.32,而其余几个阶层的辈出率均小于 1。文科当中高低阶层辈出率最大差距为 26 倍,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就读文科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 26 倍。

其次,在理科中,十大阶层中前六个阶层的辈出率均高于 1。同样,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辈出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最高,为 4.53,其余四个阶层的辈出率都未达到平均值 1。与文科有所不同的是,在理科当中,高低阶层辈出率最大差距缩小到 12 倍,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就读理科的机会是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子女的 12 倍。再者,

工科中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类似于文科中的情况,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工商户这五个阶层的辈出率都大于 1,其中仍然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辈出率最高,为 4.58,而其余五个阶层的辈出率均小于 1。有所不同的是,工科中高低阶层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比文科中的小,但高于理科的辈出率,为 16 倍,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就读工科的机会是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子女的 16 倍。

最后,在管理学中,与工科相似的是同样的五个阶层的辈出率都大于 1,同时,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辈出率仍然最高并上升为 7.37,其余五个阶层的辈出率均小于 1。所不同的是,高低阶层辈出率的最大差距上升到 43 倍,为四科之最,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就读管理学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 43 倍。

上文只是对各阶层子女在每个科类中的入学机会差异情形进行了分析而无法获知各阶层子女在这四科间的机会差异状况。为此,我们对四科中不同阶层的辈出率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2),通过每个科类中辈出率的标准差值(标准差反映了相对于平均值的波动幅度,标准差值越大,表明波动幅度越大,即差异越大;标准差值越小,则波动幅度越小,即差异越小),可以看出各阶层子女在科类间的机会差异程度。表 2 显示,辈出率标准差最大的是管理学,为 2.55。这说明相对于其他科类而言,管理学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最大。标准差最小的是理科,即理科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最小。

表 1 各科类中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比例与辈出率

社会阶层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经理人员	私营企业主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个体工商户	商业服务业员工	产业工人	农业劳动者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合计
社会阶层比例 A (%) ^[2]	2.1	1.6	1.0	4.6	7.2	7.1	11.2	17.5	42.9	4.8	100.0
文科学生家庭所处阶层比例 B1 (%)及 辈出率(=B1/A)	13.3	4.7	3.5	21.1	5.9	10.9	3.9	9.8	25.8	1.2	100.0
理科学生家庭所处阶层比例 B2 (%)及 辈出率(=B2/A)	9.5	4.0	2.0	16.2	8.3	9.9	4.3	13.2	30.6	2.0	100.0
工科学生家庭所处阶层比例 B3 (%)及 辈出率(=B3/A)	9.6	3.5	4.3	16.8	5.0	11.7	2.7	15.9	28.7	1.8	100.0
管理学学生家庭所处阶层比例 B4 (%)及 辈出率(=B4/A)	15.5	4.2	6.3	15.9	7.1	9.6	6.7	13.0	20.9	0.8	100.0

表2 各科大类不同社会阶层辈出率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科类	平均值	标准差
文科	2.1460	2.10328
理科	1.7410	1.40443
工科	1.9300	1.67935
管理学	2.4080	2.55197

上述分析显示,各阶层子女在文、理、工、管四大科类中的入读机会存在显著差异,位于十大阶层中上阶层方面的子女具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子女,而位于较低阶层的子女则处于劣势地位。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各科类中入学机会的差异部分是由于各阶层子女在能否接受高等教育这第一步的入学机会上便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具有一定的传递性^[3],会进一步在子女选择科类时得以再现。同时,由于各科类中具体专业所体现的

表3 各专业中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比例与辈出率

社会阶层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经理人员	私营企业主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个体工商户	商业服务员工	产业工人	农业劳动者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合计
社会阶层比例 A(%)	2.1	1.6	1.0	4.6	7.2	7.1	11.2	17.5	42.9	4.8	100.0
语言文学比例 B1(%)	19.0	6.9	0.0	15.5	5.2	12.1	1.7	13.8	25.9	0.0	100.0
辈出率 = (B1/A)	9.03	4.31	0.00	3.37	0.72	1.70	0.15	0.79	0.60	0.00	/
音乐教育比例 B2(%)	16.1	6.5	19.4	22.6	6.5	22.6	3.2	0.0	3.2	0.0	100.0
辈出率 = (B2/A)	7.68	4.03	19.35	4.91	0.90	3.18	0.29	0.00	0.08	0.00	/
英语教育比例 B3(%)	7.4	2.9	0.0	22.1	8.8	7.4	5.9	10.3	33.8	1.5	100.0
辈出率 = (B3/A)	3.50	1.84	0.00	4.80	1.23	1.04	0.53	0.59	0.79	0.31	/
物理学比例 B4(%)	5.2	4.2	1.0	14.6	7.3	5.2	5.2	6.3	47.9	3.1	100.0
辈出率 = (B4/A)	2.48	2.60	1.04	3.17	1.01	0.73	0.47	0.36	1.12	0.65	/
应用化学比例 B5(%)	10.3	3.1	1.8	15.2	4.9	13.8	5.4	15.2	28.6	1.8	100.0
辈出率 = (B5/A)	4.89	1.95	1.79	3.30	0.68	1.95	0.48	0.87	0.67	0.37	/
冶金工程比例 B6(%)	4.9	1.6	0.0	13.1	3.3	18.0	6.6	3.3	44.3	4.9	100.0
辈出率 = (B6/A)	2.34	1.02	0.00	2.85	0.46	2.54	0.59	0.19	1.03	1.02	/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比例 B7(%)	7.1	7.1	0.0	17.9	7.1	10.7	3.6	10.7	35.7	0.0	100.0
辈出率 = (B7/A)	3.40	4.46	0.00	3.88	0.99	1.51	0.32	0.61	0.83	0.00	/
软件工程比例 B8(%)	14.9	2.3	17.2	16.1	4.6	10.3	2.3	16.1	13.8	2.3	100.0
辈出率 = (B8/A)	7.12	1.44	17.24	3.50	0.64	1.46	0.21	0.92	0.32	0.48	/
通信工程比例 B9(%)	7.3	2.1	2.1	17.7	9.4	13.5	2.1	13.5	32.3	0.0	100.0
辈出率 = (B9/A)	3.47	1.30	2.08	3.85	1.30	1.91	0.19	0.77	0.75	0.00	/
行政管理 B10 比例(%)	2.5	2.5	0.0	0.0	10.0	7.5	7.5	15.0	55.0	0.0	100.0
辈出率 = (B10/A)	1.19	1.56	0.00	0.00	1.39	1.06	0.67	0.86	1.28	0.00	/
工商管理比例 B11(%)	13.0	6.5	7.8	18.2	3.9	11.7	6.5	14.3	16.9	1.3	100.0
辈出率 = (B11/A)	6.18	4.06	7.79	3.95	0.54	1.65	0.58	0.82	0.39	0.27	/
会计比例 B12(%)	22.0	3.4	7.6	19.5	8.5	9.3	6.8	11.0	11.0	0.8	100.0
辈出率 = (B12/A)	10.49	2.12	7.63	4.24	1.18	1.31	0.61	0.63	0.26	0.18	/

(1) 各阶层子女在文科专业方面的机会差异。此次调查的文科中共有三个专业,汉语言文学、音乐教育和英语教育。下面对这三个专业逐一分析。

在汉语言文学中,辈出率最高的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为 9.03,最低的是商业服务员工阶

入学机会的多寡及个人预期收益的高低有所不同,各阶层子女在选择具体专业时对入学机会和预期收益会给予不同的关注,这种不同的关注也会造成在科类上的机会差异。下文在分析各阶层子女在具体专业上的机会差异时会谈到此缘由。

2. 各专业中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状况

上文只是从科类角度对不同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情况进行了粗略的分析,这只能使我们对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差异程度有一个很模糊的印象。由于每个科类中包括众多的专业且各个专业本身也有强弱、冷热之分,因此,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各阶层子女的机会差异状况,下文将从所调查的分布于四大科类中的 12 个专业入手,分析各阶层子女在具体专业入读方面的机会差异。各阶层子女在 12 个专业中的分布比例及辈出率统计结果见表 3。

层,为 0.15(为了便于比较,此处剔除阶层辈出率为 0 的,下文同),二者的差距为 60 倍。音乐教育当中,辈出率最高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为 19.35,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辈出率也较高,为 7.68,二者分别为辈出率最低的农业劳动者阶层(为 0.08)

的242倍和96倍,表明这两个阶层的子女就读音乐教育专业的机会分别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的242倍和96倍。相对于汉语言文学而言,音乐教育专业中高低阶层辈出率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该专业的就学成本很高,年收费大都在8000元甚至更高,而更为重要的是就读该专业需要早期大量的经济投入,高昂的就学成本使没有多少经济资源的下层社会子女不得不放弃选择该专业。从表3各阶层的辈出率可以清楚地看到,选读音乐教育专业的大都是中上层子女,而占人口60.4%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产业工人辈出率为0,而农业劳动者辈出率仅为0.08)几乎没有多少机会能够就读该专业。昂贵的就学成本必然使各阶层子女间的机会差异扩大。

在英语教育专业中,辈出率最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为4.80,最低的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为0.31,二者的差距为16倍。该专业中高低阶层辈出率的差距之所以会迅速下降,是由于该专业收费标准相对较低(所调查学校该专业年收费大概在3850元左右),为大量低收入阶层子女提供了相对于较多的选择机会。这从表3英语教育专业中几个较低阶层的辈出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可以看出。

(2)各阶层子女在理科专业方面的机会差异。理科当中共有两个专业,物理学和应用化学。在物理学中,辈出率最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为3.17,最低的是产业工人,为0.36,二者的差距为9倍。应用化学中,辈出率最高的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为4.89,最低的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为0.37,其中二者的差距为13倍。相对于文科中的几个专业而言,各阶层子女在两个理科专业中入学机会的差异明显在缩小。同时,从表3各阶层在这两个专业中的辈出率也可以看出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有缩小的趋势,其中占就业人口42.9%的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辈出率在物理学中超过了平均值1,产业工人阶层在应用化学中的辈出率为0.87,也接近于1。这说明,占就业人口很大一部分的农业劳动者和产业工人阶层子女在像物理学、应用化学这样的不是很热门的基础理论专业中拥有较多的入学机会。

(3)各阶层子女在工科专业方面的机会差异。此次调查的工科当中共有冶金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软件工程和通信工程四个专业。下面我们分别看各阶层子女在这四个专业中的机会差异程度。

首先来分析冶金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这两个专业(这两个专业在所调查的高校中处于相对较弱地位)。在冶金工程中,辈出率最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

为2.85,最低的是产业工人,为0.19,二者的差距为15倍。其中,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两个阶层的辈出率都超过了平均值1。城市地下空间工程这个专业中,辈出率最高的是经理人员阶层,为4.46,最低的是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二者的差距为14倍。其中,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辈出率也接近于平均值1,为0.83。这表明,下层社会子女在像冶金工程等这样的弱势专业中拥有较多的入学机会。

其次,看一下相对具有一定优势的两个专业,软件工程和通信工程。软件工程专业中,各阶层辈出率差异幅度较大,最高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两个阶层的辈出率为7.12和17.24,分别是辈出率最低的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辈出率为0.21)的34倍和82倍。同时,相对于冶金工程和城市地下空间工程而言,农业劳动者阶层辈出率下降幅度较大,降到0.32。这说明,在软件工程这样的强势专业中,上层社会子女拥有更多的入学机会,而下层社会子女则没有多少入学机会。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通信工程专业中。在此专业中,高低阶层辈出率(最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3.85,最低的是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的0.19)的最大差距为20倍。此差距虽然相对于软件工程专业来说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前文两个较弱势专业的差距。

(4)各阶层子女在管理学专业方面的机会差异。在管理学中,我们调查了三个专业:行政管理(一般专业)、工商管理 and 会计(两个热门专业)。首先来分析行政管理专业中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程度。表3显示,在行政管理专业中,各阶层辈出率差异明显较小,高低阶层辈出率的最大差距仅为2倍(辈出率最高的是经理人员,为1.56,最低的是商业服务业员工,为0.67),是所有调查专业中差距最低的。这意味着,就所调查的12个专业而言,行政管理专业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最小。此外,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辈出率再次超过平均值1且在所有专业中最高,为1.28。这体现出,在行政管理这样的普通专业中,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有较多的入学机会。

其次,在工商管理专业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差异有所扩大:相对于行政管理专业而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四个阶层的辈出率上升幅度较大。同时,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辈出率迅速下降,降到0.39。其中,高低阶层的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扩大到29倍(辈出率最高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为7.79,最低的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为0.27)。

最后,在会计专业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

再次扩大,高低阶层辈出率的最大差距增长到58倍(辈出率最高的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为10.49;辈出率最低的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为0.18),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就读会计专业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58倍。此外,占就业人口很大一部分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两个阶层的辈出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辈出率竟下降到0.26。

这再次显示在工商管理、会计这些热门专业中,中上阶层子女拥有更多的入学机会而较低阶层子女则没有多少机会进入这些专业就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各阶层子女在具体专业的入读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大体而言,中上阶层子女大多就读于一些优势专业而更多的下层社会子女则就读于一些较为普通的或就学成本较低的专业。这表明,“社会出身既表现为对一些出身低下的儿童的纯粹淘汰,又表现为对免遭淘汰的人在选科类方面的限制”^[4]。其中,优势专业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较大而普通专业中差异则较小。而就各阶层子女在每个科类各专业间的总体差异程度而言,仍然与前文分析各阶层子女在科类中入学机会的差异情况基本相吻合,即各阶层子女在管理学和文科各专业中的机会差异较大,在工科各专业中次之,而在理科的机会差异最小(这从上文所分析的专业中高低阶层辈出率的最大差距可以看出)。

导致各阶层子女在具体专业方面出现机会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上阶层子女相对而言拥有较多的入学机会,加之其家庭有较高的支付能力,因此他们在选择专业时更多的是考虑专业的冷热程度,即该专业未来个人预期收益的高低,而较少考虑个人能否被录取的入学风险。这样,他们自然倾向于选择那些有较强优势的专业,而对于较低阶层子女来说情况则恰恰相反。由于他们所能够拥有的入学机会并不是很多,因而在选择专业时首先考虑的是能否被录取。倘若他们选择了那些竞争比较激烈的优势专业,有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因此,出于理性的考虑,他们更偏向于选择那些基础理论专业或就学成本较低的专业,因为这些专业竞争不是很激烈,意味着较高的被录取的可能性。对入学风险和个人预期收益的不同关注最终导致了各阶层子女在专业上的入学机会差异。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对各阶层子女在科类选择和专业入读

方面机会差异的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第一,各阶层子女在文、理、工、管四科的入学机会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而就每一科类而言,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差异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其中,在管理学中,差异最大,其次为文科和工科,而在理科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最小。

第二,各阶层子女在科类中的入学机会差异,一方面是起因于各阶层子女在能否接受高等教育这一入学机会方面的差异(入学机会包括能否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即就读于哪种类型、层次的高校以及就读于哪些科类和专业,前一种入学机会方面的差异具有一定的传递性,其差异会在后一种入学机会上得以体现)。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科类本身的特点,即每个科类中所设置的专业数量以及专业的强弱程度,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各阶层子女在科类中的机会差异。各阶层子女在科类中的机会差异最终体现在具体专业上的机会差异。

第三,各阶层子女在本课题所调查的专业方面入学机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中上阶层子女更多地就读于一些优势专业或就学成本相对较高的专业(这些专业预示着将来较高的个人预期收益),而大部分较低阶层子女选择的则是基础理论或收费较低的专业(这些专业相对而言有比较多的入学机会)。

以上分析表明,就个人层面来讲,虽然各阶层子女在科类及专业选择方面的机会及权利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上看,对科类及专业的选择是个人理性考虑的结果。因社会分工而导致的阶层间的差异必然反映在科类及专业入学机会的差异上,且一定范围内的差异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倘若各阶层子女在科类及专业入学机会上的差异过大以至于不利于较低阶层子女时,且特定阶层子女大致只能选择特定的学科或专业,那将同时违反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就效率原则而言,应该是各个科类及专业是向每个阶层的子女开放的,以便扩大每个阶层子女的选择范围和选择权利;各阶层子女可根据各自的需求,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能力、志趣发展的科类和专业以各得其所。这样便可以提高高校中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就公平原则来讲,应该是每个阶层的子女在各个科类和专业的选择上有大致相同的机会。倘若高阶层子女更多地就读于一些科类中的热门专业而低阶层子女大多只能选择那些较普通的基础理论专业,意味着各阶层子女在科类和专业入学机会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不符合公平原则。

(下转第66页)

限的延长。另外,应该鼓励博士生寻求一些难度大的问题进行研究,“难度大”不但意味着“失败的”可能性大,研究的时间也会相应延长。

博士生培养模式的改变,必然涉及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其他方面的问题:

第一,招生问题。博士生的生源至少有一半是“基地”的保送生,可确保质量。另一部分的招生通过现行的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进行选拔,但在这些学科不应再通过在职人员单独考试的方式招生,这是由于这些“条件成熟的学科”都是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学科,注意其学习的连续性是重要的。

第二,关于导师与“导师组”。导师由遴选确定;“导师组”由博士生导师确定,应根据学生的旨趣、知识结构、研究方向组成“导师组”。博士生指导教师应该在学生入学时确定,导师组要在取得攻读博士学位资格后确定。

第三,关于“淘汰制”。实行“淘汰制”是西方发达国家培养博士生的通常做法,说得严重点,没有淘汰就没有质量。笔者建议,实行新的培养模式,淘汰率应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确定“攻读博士学位”分两

次进行,第一次在第二学年结束时,通过者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对于未通过者,在第三学年初进行“补试”,通过“补试”再确定百分之三十。

第四,关于在校学习年限与毕业。在校学习年限最多不能超过8年,而对于8年尚不能完成博士论文者,可在工作中继续完成论文,直到完成为止。学生通过论文答辩即为毕业,对于不能完成或不愿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者,可以提交硕士论文,答辩通过后按硕士毕业。

[参考文献]

- [1]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文献选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2] 方福德. 博士培养之我见[J]. 中国高等教育,1999,(17):24.
- [3] 孙学珠. 优化博士生培养方案,造就国际一流水平的博士人才[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8):65.
- [4] 刘桔,林梦泉. 从全国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看我国博士学位论文质量[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0,(2):28.
- [5] 王乘. 我所经历的MIT教育[J]. 高等教育研究,1996,(4):59.
- [6] 薛天祥. 研究生教育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5.
- [7] 陈学飞. 西方怎样培养博士[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49.
- [8] 王忠烈.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比较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0.

(上接第62页)

鉴于此,为了缩小各阶层子女在科类专业入读方面的机会差异以实现效率和公平原则,就高等教育系统本身而言,一方面,应加大宣传力度,增强高校有关科类、专业方面的信息透明度以便减少尤其是较低阶层子女在选择科类专业时的盲目性。另一方面,对重点高校的收费政策和助学贷款等政策进行相应的改革。

与我国其他类型高校的收费标准相比较,目前部属重点高校的收费标准总体上是比较低的,这与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是相违背的,出现了“质高价低”的现象。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机制与政府的严格控制是有关的。为了改善这种扭曲的收费制度,政府应适当放开对这类高校收费标准的管制,让这类高校在学费的制定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每个高校可以根据其所提供的教育质量而实行差别收费,即高质量的高收费,低质量的低收费。这样以来,重点高校可以提高热门专业的收费标准。收入的增加可使国家对这类高校的投资适当降低以减轻国家负担或在政府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高校可将收入增加的部分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以减少或分担这类学生的入学风险。需要说明的是,重点高校收费的提高必须同时辅之于助学贷款力度的加大和覆盖面的拓宽。

惟有如此,才可以体现收费政策的差别原则(针对高校提供的不同教育质量而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和补偿原则(对高校中的弱势群体学生予以资助)。

在收费及助学贷款政策的改革中,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有关调济原则的制定上,即通过规定各高校中助学贷款的数额及比例等使补偿原则得以实现。

收费政策的调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止更多的人选择热门专业,而贷款政策的实施可以为较低阶层子女在选择科类专业时提供更多的机会。这样,政策的相应调整与改革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缩小各阶层子女在科类专业上的机会差异,使各阶层子女在各科类专业上有大体相同的选择机会,不仅有利于各学科及专业自身间的平衡发展,也有利于各阶层子女在科类专业入学机会上的更加平等。

[参考文献]

- [1] 翁文艳. 日本学校教育中的平等与不平等问题的考察[J]. 外国教育研究,2002,(9):1-5.
- [2]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3.
- [3] 谢作栩. 闽、湘、川三省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初步调查[J]. 教育与经济,2004,(3):3-6.
- [4] 布迪厄. 继承人 - 大学生与文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8.